



笔墨为桥 写尽半世乡愁

写过华侨聚散,当过寻亲“智囊”……听泉州最后一位代书人讲述“侨批”的故事

■海都记者 吴雪薇 文/图

“明天您还会出摊吗?”13日晚,记者拨通76岁的姜明典电话,问采访是否需要改期。他干脆回答:“出。我风雨无阻都在这里,你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。”

在泉州石狮老城区人民路的联谊商厦入口,一张临街的木桌摆着字典、法律书、压书石,桌前挂着“代书侨信”的小牌子;另一张桌放在阴凉处,上头摆着旧报纸和信稿。这里是姜明典的“摊位”,也是许多华侨、侨眷心灵的寄托。大家都说,他是泉州地区最后一位代书侨信的人。



姜明典在他的代书摊位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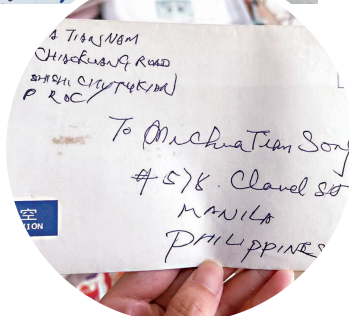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怕有需要的人找不到我”

每天早晨七点半,姜明典会先支好桌子,再去吃早餐、晨跑,九点钟骑电动车回来,直到晚上七点半才收摊。“我怕有需要的人找不到我。”他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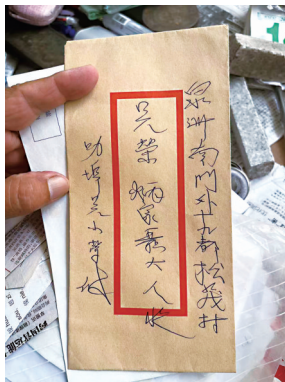
代书业务五花八门:侨信、契约、遗嘱,甚至英文信件,他都能写。摊位前,不时有人带来信纸,或来咨询法律、家事、海外事务等。诉状、发言稿、墓志铭、房屋租赁合同等,姜明典无一不会,总能让客户满意而去。

“‘天启良人’,良人你知道什么意思吗?夫君的意思。”父母或者祖先要称“尊亲”,妻子要称“妾”……16岁时,姜明典开始跟着

父亲学习如何为人代书侨信,如何写称呼是他学习的第一步。他的案头还常年放着几本字典,以供遇见生僻或专业词汇,随时查阅。日子久了,他几乎成了多种外语写作的“专家”及一个行走的“华侨地址库”。“只要能说出闽南话的地址,我就能写给他们。”姜明典说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,邮电局有许多从海外发来的电报,因为华侨只会使用闽南话写名字和地名,这让不少只经过了标准普通话训练的电报员和邮递员颇为犯难,有人便会求助姜明典。“只要过我手的信件,没有送不到的。”他颇为得意。



姜明典手写的英文批封



姜明典手写的传统中文批封

写的不仅是信,更是聚散与牵挂

20世纪60年代,初中毕业、成绩优异的姜明典因家庭问题被迫中断学业,需要找一个出路。母亲对他说:“一枝草一点露,每一枝小草都可以吸收一点露水,不管怎么样总是有出路的。”十几岁年轻人做代书,阅历还是太轻浅了。为了打响自己的“口碑”,在母亲的建议下,18岁的姜明典背着装有信纸、信封和几支笔的书包,开始下乡为侨眷读信、写信。这一奔波,就是十年。

在闽南,客居南洋的华侨叫“番客”,“番客”留在家乡的妻子,叫“番客婢”,她们是姜明典最主要的顾客群体。“写一张信2毛、3毛,我一天可以赚两

三元。”白天,姜明典下乡写信,晚上,对着收音机听广播,学英语、学古文。在那个中学教师收入不过几十元的年代,他靠跑腿“卖字为生”,收入也算可观。

那时,华侨寄回的家书往往附带汇款,这些汇款与书信合一的信件又叫“侨批”,是侨眷们的生活所系,也是情感依托。姜明典记得,他曾下乡到一个海边的小渔村,一位番客婢找到他,问道:“写信的先生,你到过石营(音)村写信吗?”原来番客婢的前夫曾在抗战的年代下南洋,前往菲律宾讨生活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海内外音信断绝,失去丈夫音信与生活来源的她不得不带着女儿改嫁。

姜明典恰好曾为她丈夫的婶母写过侨批,原来在菲律宾的丈夫失去妻子音信,也已另娶,只在每年农历七月与春节寄钱回原本的村子,嘱咐家人祭祀祖先。

这样被时代与距离打散的苦命鸳鸯,他在58年的代书经历里,还见过许多。有位独守大院的老人,曾让姜明典写信,埋怨丈夫“坐令红粉青山,转眼老去,春花秋月等闲虚度”。但其实在菲律宾的老先生早已去世,儿子不忍老母难过,仍旧以父亲的名义,每个月寄50元给老人作生活费,直到老人去世。“很多下南洋的人,几十年都没有再回来。”这是让姜明典印象最深的一位番客婢。

侨信中浓浓的情感寄托,什么也取代不了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,永宁镇西岑村的一位台胞找上了姜明典,说自己的故乡在台湾云林,几度委托姜明典往台湾相关部门写信寻亲,但两三年都没有什么效果。姜明典决定直接将信寄给云林县长。在有关方面的热心协助下,云林县成功找到了这名台胞在台湾的兄弟。“可惜他父母已经去世,但他还有一个妹妹,和他长得简直一模一样。”这户两岸家庭后来还特别找

到姜明典的代书摊,向他表示感谢。

据《泉州市华侨志》记载,仅1952年至1965年,由民间渠道汇回泉州各县(市、区)的侨汇,即达45120万元人民币。改革开放后,他开始为大量侨眷处理出国申请手续,帮助他们出国寻亲。直到20世纪80年代,随着邮政系统和银行电汇的普及,存续百年的侨批业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如今,虽然便捷的现代

通信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连接起相隔万里的人们,但不时还会有零星客户找上他,要依传统,用文言文、传统格式,以繁体字写侨信、碑文、邀请函。写好的书信被直接拍照,一键发送给海外亲人,省去了过去归期无定的漫长等待。“电子的信息,总不比纸面上的文字来得有仪式感,有温度。”姜明典觉得,科技的发展提升了传递的速度,但那些侨信中浓浓的情感寄托,是什么也取代不了的。

下班即上线 不少人骑车兼职送外卖

“00后”上班族视之为解压体验;专家表示,骑自行车送外卖的年轻人多为生活体验,或对专送骑手形成一定的“抢单压力”

■海都记者 梁展豪

近期,一种新型的“轻兼职”模式在城市青年群体中悄然兴起:不少上班族在结束白天的工作后,换上骑行服,骑上自行车,加入外卖配送队伍,利用晚间几小时赚取额外收入或体验生活。

“00后”下班骑车送外卖 在体验中释放压力

晚上7点,福州的街头华灯初上。刚结束一天工作的“在桃”(化名)从公司走出,换上轻便的骑行服,跨上早已准备好的公路车,打开外卖平台APP,正式开启她作为兼职骑手的夜晚。

25岁的“在桃”是一名电商运营员,也是一名资深骑行

爱好者。由于工作性质需要长时间坐在工位上处理数据和对接客户,她坦言:“坐一天,身体不活动,精神也容易紧绷,需让自己‘动起来’。”

出于对运动和解压的需求,她偶然了解到有人下班后兼职送外卖,既能锻炼身体,又能接触社会百态,便萌

生了尝试的念头。如今,“在桃”每周会抽出2~3个晚上,从19点跑到22点,专注做兼职骑手。她坚持一单一送的节奏,不追求高单量,最长一次完成5单。“我主要是骑车,顺带送餐,所以接单比较谨慎,不会太赶。”她说,送外卖挺有意思,每一单都有目标、

有反馈,还挺有成就感的。

像“在桃”这样的年轻人正逐渐增多。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看到,全国各地许多骑行送外卖的年轻人都在发帖分享经历。他们不急于抢单、不追求极限时效,而是把这份工作当作一种融合运动。

专家: 骑车送外卖多为体验 或给专送骑手带来压力

对于骑行送外卖的现象,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表示,目前外卖行业已经处于饱和阶段。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,上班族成为兼职众包骑手,加入外卖配送队伍的现象逐渐增多。

甘满堂分析认为,选择骑自行车送外卖的年轻人,大多并非出于生计压力,而是将此作为一种生活体验或短期职业探索。他们普遍经济基础

较为稳定。通过这种“低门槛、高灵活性”的兼职方式,不仅能锻炼身体,还能与人互动,拓展社会交往网络。

然而,这种现象也可能对专送骑手产生一定影响。甘满堂表示,随着兼职骑手数量的增加,尤其是在一些订单量相对固定的区域和时段,兼职骑手可能会分流部分订单,从而对专送骑手形成一定的“抢单压力”。

兼职骑手抢饭碗? 专送骑手看法不一

对这种“既赚钱又锻炼”的生活方式,在网络上,有支持者,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。记者采访了两位在福州跑外卖的骑手。

张强(化名)在鼓楼区从事外卖配送三年,是一名专送骑手。“现在跑外卖的人确实比以前多了很多,但是近段时间平台的单量也有增加,订单

都稳定在40单左右,与之前没有什么变化。”张强认为,骑自行车送外卖的年轻人以体验为主,在效率上还无法与专送的骑手形成竞争。

另一位骑手李伟(化名)则认为,“如果这类兼职者越来越多,而且开始追求更多收入,那未来可能对我们形成一定冲击。”